

# 意想不到的职业女性，殊途同归的自由意志

郭 彦

“穿越”在当下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设定，然而，在一般的女性向作品里，“穿越”后的女性主人公无论拥有何种身份——公主、才女、婢女抑或是绣女、医女、侠女……故事多以家庭为活动轴心，以亲缘与性缘的变动为人生驱动力，描写她们职业生活的笔墨甚少。当然，有部分原因是这些空间大半“穿越”到了古代，可描写的空间狭窄。不过，即便“穿越”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生产力大发展的工业时代，人们对妇女的职业想象依旧贫瘠，停留在家庭教师、文职秘书、纺织女工等有限的职业身份上。

设若有一位作家要积累素材，描写以职业生活为主体的“穿越女”的故事，该如何取材呢？以下这几本著作，或许可为撰写职业女性故事提供启发。

## 消费赋权——家庭内部决策如何影响能源市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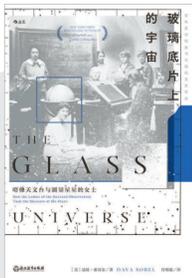
只将目光聚焦在传统职业上，势必无法推陈出新。要将视野放大，先从不够为人熟知的职业入手。阿比盖尔·哈里森·摩尔的这本《持家的人：女性劳动与能源变革》就提供了新的思路。它向读者介绍了艾格尼斯·加勒特和罗达·加勒特姐妹这对专业装潢咨询师。她们是英国首家全女性设计和装潢公司的创始人，在1877年出版了《家庭装潢建议》，直接面向女性读者。

19世纪60年代以前，家庭装潢决策主要是男性作出的，那时候家里的一切决策都以男性为主导。到了19世纪70年代，像加勒特姐妹这样的职业女性试图推动女性在家庭装潢中的决策权，利用消费决策权提升家庭话语权。她们面向中产阶级，提供了“一套简单的、不花太多钱就能让家居环境更美、更健康的方法”，并帮助客户买人先进的燃气或电力设备。另一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女性霍伊斯夫人在两姐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，她竭力推广更安全、便捷的电灯——当时英国家庭广泛使用的蜡烛和煤油灯安全隐患极大。她呼吁女性创造符合自己价值观念和品味的家，在装潢师的辅助下行使自己的家庭管理权。

在燃气和电力公司的市场竞争中，女性在说服消费者在家中作出能源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，像女性电气协会这

### 《持家的人：女性劳动与能源变革》

[英]阿比盖尔·哈里森·摩尔  
[加]R.W.桑德威尔 著  
李菲译  
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



《玻璃底片上的宇宙：哈佛天文台与测量星星的女士》  
[美]达娃·索贝尔 著  
肖明波译  
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出版

### 《实验室女孩》

[美]霍普·洁伦 著  
蒋青译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



《让火箭起飞的女孩：仰望星空的初代程序员》  
[美]娜塔莉亚·霍尔特 著  
阳曦译  
九州出版社2022年出版

样的组织更为电力技术的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有成百上千位指导、推广和示范用电的女性电气协会工作人员持续付出，提升数百万房主对于家庭电力消费的认知。这其中，身为协会干事、《女性工程师》编辑的卡洛琳·哈利利特正是另一位职业样板。她不仅挖掘了独立电气工程师玛格丽特·帕特里奇，更积极介入政治，为女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家庭能源的变革，不仅造就了与之相关的职业女性，更为普通家庭主妇带来新的观念：家庭内部的许多工作和决策都具备社会价值，劳动方式和社会关系并非一成不变，每个人的每个选择都在影响世界。

在现下这样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，人人都在互相提醒不要走进消费主义陷阱。然而将时钟拨回到19世纪末，英国女性还没有完全获得选举权。她们通过消费获得的一点话语权是撬动现状、争取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。尽管家庭装潢、能源选择等决策看起来琐碎、不值一提，可英国的已婚妇女却从中逐渐建立起独立掌控财产、行使决策的意识。像加勒特姐妹这种针对女性用户群体的职业女性，也有了充分发挥能量的舞台，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新兴职业女

性，英国女性正是依靠这一点一点微小的权力争取，最终赢得了财产平等、人格独立。

## 自我学习——单调的劳动如何引起知识质变

如果说消费赋权观具有一定争议，那么这本《玻璃底片上的宇宙：哈佛天文台与测量星星的女士》在女性职业介绍方面则显得更为“纯粹”。书中记录了不少“天文观测女工”的故事，她们所做的工作看似简单：每天晚上观测恒星的亮度变化并记录下来，不需花费什么力气。然而实际上，观测任务十分繁重，要确定任何一颗恒星（即可变的恒星）的光周期，都需要进行成千上万次观测。有时，一个晚上就要进行900次测量。测量后，拍摄下来的玻璃底片也需要整理，再运用公式进行计算。

从事这份工作的弗莱明太太的上一份职业是女佣。她七岁丧父，后来与丈夫詹姆斯·奥尔·弗莱明结婚，移民美国，但很快丈夫抛下怀有身孕的她消失了，她只好出门找了一份女佣工作。可能因为过去在苏格兰做过教师，她很快被雇主——

哈佛天文台的爱德华·皮克林的太太推荐给丈夫，做了天文台的抄写员和计算机员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工作，弗莱明太太的观测技术逐渐升级。开始，她只是进行记录，并使用皮克林给出的公式计算恒星的星等，后来，她学会了看光谱和光谱线，并且能够从玻璃底片上的星域中判断出星等来。

1890年，在工作了近十年后，她在哈佛天文台《纪事》的第二十七卷发表了《德雷伯恒星光谱星表》。1891年，她在海豚座发现了一颗新变星，自此探测新的变星成为她的强项。而她的辨别方法，正是从长年累月的观测和记录中总结出来。弗莱明太太的成功不出意外地招来了争议。赛思·卡洛·钱德勒就曾在自己发布的星表中忽略她的几乎所有的最新发现，在一个附录中，还将她发现的十几颗变星描述为“据称如此但未证实”，因为他对哈佛天文台的观测方法持保留意见。不过这样的敌意并未持续到最后，1898年，一颗新的小行星出现，为了测算位置，钱德勒不得不向哈佛天文台求助，寻得他们的拍摄记录。弗莱明太太从十万张库存中挑选出最有可能的照片，花了好几个月梳理，最终在1899

年找到了钱德勒要找的那颗小行星的影像资料。这颗促成科学共识的小行星，正是大名鼎鼎的爱神星(Eros)。

同样是1899年，曾经的女佣弗莱明太太，被哈佛董事会正式任命为新设立的天文照片馆馆长，42岁的她，是首位在天文台、学院乃至整个大学拥有头衔的女性。此后，弗莱明太太愈发勤奋，她的《变星的一种照相研究法》，给出了3000多颗恒星的位置和星等，它们都曾被用于追踪她发现的200多颗变星。从一开始单调乏味的辅助性工作到后来独具慧眼的创造性工作，弗莱明太太完成了艰苦而又快乐的自我学习，再次证明了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。不过略显遗憾的是，全书大部分都称呼她为弗莱明太太，只在一个地方记录了，她称呼自己为米娜·弗莱明。

## 突破舒适——不一样的选择如何助力重塑自我

无独有偶，娜塔莉亚·霍尔特的《让火箭起飞的女孩：仰望星空的初代程序员》一书也记载了一群从事基础工作的职业女性。大萧条期间，美国政府雇佣了450位计算机员，其中有76名女性。而在喷气推进实验室(JPL)，却汇聚了一支富有数学天赋，且全是女性的计算机员团队，她们用智慧的劳动，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火箭升空，这是相当难得的。要知道，在1960年的美国，有工作的妈妈是一种稀有动物；孩子不满18岁的美国已婚女性里只有25%的人会上班。更可贵的，随着时代发展，计算技术不断进步，这些计算机员女孩没有因为舒适区而被职场淘汰，而是直面挑战，学习新的技术，逐渐变成NASA的第一批计算机程序员。在技术不断革新的年代，她们需要经常学习新设备的使用方法，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。技术问题没能阻挡实验室女孩们的升级之路，到70年代时，实验室90%的编程工作都由她们负责。彼时，有些大学的工程系刚刚开始招收女学生，而JPL的女雇员们却已经完成了从计算机员到工程师的转型。

能够保证她们坚定开展职业人生的因素，除了这些女孩自身的坚持，团体互助的氛围也必不可少。JPL团队几乎所有女性都遭遇了生育困境。在怀孕期

间，出于种种考虑，她们总是不得不在继续就职和辞职回家中做选择。即使是身为主管的芭芭拉·鲍尔森，也不能免除这样的命运。好在同样身为女性管理者的海伦·凌没有忘记自己的伙伴，在芭芭拉生育后，邀请她回到实验室。JPL愿意为妈妈们做一些妥协，给她们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。同样是生育后回到工作岗位的苏·芬利甚至逐渐治好了自己的焦虑症——这一点在如今恐怕不一定能得到理解，因为当下很少有人会真心实意地表达“工作让我快乐”。然而在上世纪，工作，真的能改变一些女人的生活，让她们换一种活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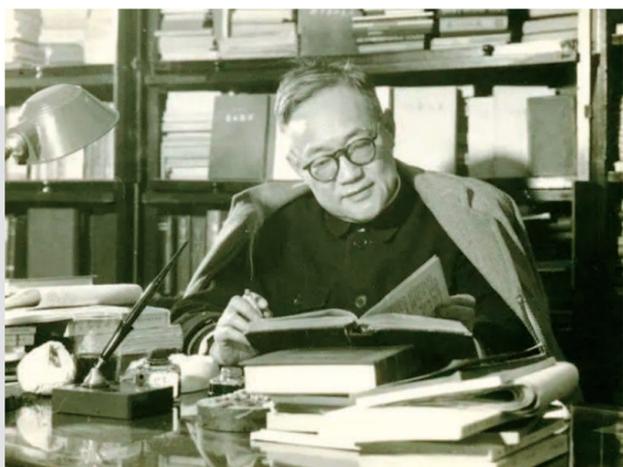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这种群体聚力的职业有“圈地自萌”的嫌疑，那么霍普·洁伦的自传《实验室女孩》可以给出更为具体、更为个体的职业参考。三获富布赖特奖、斩获两枚地球科学领域青年研究者奖章的她，是一名地球生物学家。因幸运地生于20世纪中后期，她与上述女性相比，拥有更广阔的职业道路。尽管如此，在明尼苏达大学念本科时，她每周都工作20小时，打过十种不同的工，因为有些东西必须要亲自体验。她认为：“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不做别人安排好的实验，她会设计自己的实验，从中获得全新的知识。”在她的个人叙述中，穿插了各类植物的生长知识，她像自己所研究的植物一样愿意面对困难：“如果一件事能不经失败就获得成功，那么早就有人达成了，我们也没必要费力。”

之所以认为这四本书可以为作家提供原型参考，是因为它们将女性的职业生活具体化、可视化了。当人们谈起职业女性，不能只停留在“呼吁大家都要走出家庭，从事社会工作”的口号阶段，而是要用实际案例展现历史上职业女性的机会在哪里，她们是如何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、不断收获的。这些人所处的时代、出身境遇和所选道路虽不同，却拥有共同的生命内核：生命由自己决断，不自我设限。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，诚然我们无法摆脱天赋、出身、时代加诸己身的隐形围栏，但人之所以为人，正在于拥有自由意志，可以参与自身命运的建构。这些与众不同的职业女性的个人故事，依然可以带给当下的我们以启发和激励：去发现自己、认识自己吧，在那之后，重塑自己、成就自己。

# 致敬“殉道者”

——关于《断头台上》

周立民



巴金



《断头台上》  
萧甘著  
上海自由书店  
1929年1月出版

参观巴金故居，很多人都为多媒体室中镌刻的一段题词而感动：

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：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，每个口都有饱饭，每颗心都得到温暖。我要指干每个人的眼泪，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。

巴金 九〇年七月三日

这一段话，能够看出巴老爱的情怀和博大的胸怀。严格地来讲，它最初不是出自巴金之口，它源自凡宰特（另译为：樊塞蒂）的自传《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故事》。这篇不长的自传由巴金译出，收在《断头台上》一书中。由此，我想起了巴金这本绝版已久的书。

《断头台上》，作为时代丛书第一种，由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1月出版。也就是说，它与巴金的小说《灭亡》同时亮相，不过，它的署名不是“巴金”，而是他的本名“萧甘”。此书

只印行一版，一千册，单行本再未重印过；直到1993年它收入《巴金全集》第二十一卷，都不曾与读者再见面。巴金译著甚丰，大多数作品多次再版、重印，像《家》仅开明书店版就印过33次。如《断头台上》只印过一版的，并不太多，也算珍稀品种。

在此书的卷首，不仅有《致读者》的献诗，《呈献给“吾师”凡宰特》的代序，还有巴金以本名的英文缩写L. P. K.所写的一段英文献词：

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e sacred memory of my beloved comrade and teacher Bartolomeo Vanzetti, and his brave comrade Nicola Sacco. L. P. K. (试译：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同志兼老师巴尔托罗美·凡宰特和他勇敢的同志尼可拉·萨珂，L. P. K.)

献词中提到的两个人，巴金却永远不能忘记。凡宰特和萨珂，出生于意大利，后在美国当工人，也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。1920年，他们被冤枉为抢劫犯入狱，接下来的审判，被舆论认为是因为信仰而受到的迫害，而不是公正的审判。于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，西方世界展开了对这两个工人的救援，法郎士、罗曼·罗兰、巴比塞等人也都参与其中。1927年，巴金刚到巴黎时，正赶上救援的热潮，他义愤填膺，迅速加入声援行列，还向救援委员会捐款，并与凡宰特通信。凡宰特的遭遇打动了巴金，纯洁的心灵感染了他，为信仰而奋斗是“度过生活的最美丽的方法”的鼓励激励着他，他尊这个未曾谋面的工人为老师。萨珂一凡宰特事件，刺激巴金创作小说《灭亡》；他还说：“献给你这一本书，几年来我的血和泪都在这里了。吾师，请了解我。”（《呈献给“吾师”凡宰特》）“这一本书”就是《断头台上》。

《断头台上》是一部致敬之书，巴

金向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致敬，以翔实的材料和饱含深情的手笔描写了众多先驱者的动人事迹。他说：“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，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，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：就是，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，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，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。”（《巴金全集》第二十一卷第11页）现实中的萨珂、凡宰特是这样的人，巴金小说中的杜大心、李静淑等人何尝不是呢？考虑到《灭亡》和《断头台上》写作时间的重合性，特别是它们都与“吾师”凡宰特有精神上的牵系，我甚至可以说《灭亡》等巴金的几部写革命者的作品，小说里的这些革命者的精神气质来自于巴金的纪实作品《断头台上》。这部绝版已久的书，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，然而，在研究巴金思想和早期的文学创作中，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。

由书中《改编本书的几句说明》中可知，《断头台上》是由《革命的先驱》一书“改编”而来。《革命的先驱》为自由丛书第四种，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5月初版。全书分为两篇：第一篇为《无政府主义者殉道的悲剧》，巴金所撰，后收入《断头台上》。第二篇是十篇《无政府主义者传略》，多为巴金和其他人的译文，因此，这本书不算巴金独立著作。但是，图书在出版流传中内容发生变化，哪怕很小的细节变化，对后来的研究者也很有价值。此书中有附记、写作时间在后的《断头台上》被删除，它倒是保存了该作不少“初稿”形态。

这些文字带有巴金青年时代的印记，一方面能够看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所下的研究功夫，另一方面显示巴金心中的英雄情结，这些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。我曾看到后来有人批评巴金的小说人物写得不好，经常是大段大段的倾诉。其实，看看这里面革命者的法庭演说，对比巴金小说中的人物陈词，不禁发出会心一笑。

萨珂和凡宰特的冤案，在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平反。巴金一辈子都在关注他们，1932年，他还为他们写过小说《电椅》；1993年，九十高龄的他仍然提到“我的先生”，并说凡宰特的“这段话使我非常激动，讲出了我的心里话”。（巴金1993年10月3日致罗兰的信，《再思录》作家版第352页）1950年，巴金在《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》一文中把这段话当作自己的话，不加引号直接使用，所以，我认为它们早已融化在巴金的血液中，成为他的社会理想的形象表达。

# 考古学家的人生拼图游戏

吴世渊

1997年，郑嘉励25岁，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两年。主业考古之余，他是个“文学青年”，写了一组古物杂文，见于《杭州日报》副刊。年轻人的气质，总是活泼。写鼎、写铜镜、写弓箭，科普之余，插科打诨，在当年的报章上，这是新颖的文字。

多年以后，他重读旧文，每有“悔其少作”之感，认为过去的文字缺乏生活阅历，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不过他也承认，“成长的过程，本身并不可笑”，无论曾经多么幼稚，都是自己一路走来的足迹。

2001年，未及而立之年的郑嘉励，参与雷峰塔地宫发掘，撰写了两篇亲历手记。一篇《漫长的一天》，写发掘前后的种种瞬间，另一篇《开函记》，描述打开舍利铁函的全过程。两篇手记的发表，引起了很大轰动，作者说，这是因为雷峰塔本身的影响力。

这之后，郑嘉励很少再写杂文，甚至于全然不写，而是把精力投入主业，奔波于浙江各地，发掘古遗址、古墓葬。过程中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当地文物干部、乡下房东、考古工地里的农民工、媒体记者等等，免不了打交道；也读过许许多多的书，凡到一处，就集中阅读当地方志、古籍，这些书有很强的“在地性”，似乎只有踏上这片土地，找起来才有乐趣。

那些走过的路、读过的书、见过的人，终究有一天，会如一只敏捷的夜猫，从记忆里跳将出来。夜猫转瞬即逝于夜幕，要将其捕获，唯有用文字编织起一张大网。

2009年，37岁的郑嘉励重新开始杂文写作。他写赵伯澐墓、史嵩之墓的发掘，写丽水山区里的考古纪事，写杭州的环湖诸山、山中的摩崖石刻，写令他难以忘怀的人与事。大抵生活经验阅历，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认知。时隔多年，再度提笔的郑嘉励，文字间仿佛增添了一种“魔力”。他能让读者带回现场，在一个久远的、陌生又熟悉的空间里，听他娓娓讲述。

这些立足于考古，生长于田野，体悟于人生、社会和历史的文字，汇成一书，名为《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。书中所收录的杂文，有青年时期的古物杂谈、发掘手记，有不久前成文的《山中的杭州史》《越地佛踪》，更多则写于2009至2016年间。

我读《考古四记》，“成长”是一以贯之的主线。以文字为例，青年时才气跳跃，壮年时脉脉温情，中年以后，复杂的情感已掩藏于简洁的文字之下。

这是不划算的；醒悟过来的三四十岁，是写作的“黄金期”，情感充沛，多数文字由情绪驱动，感染力也最强；而今年过半百，考虑学术问题更加全面，情绪的力量却弱了。一个年龄段只能写一个年龄段的文字，亦如光阴，一去不复返。

除了文字的成长，还有心灵的成长。作者是个善感之人，唯其善感，才会不断求索考古对其人生的意义。

在厦门大学念书时，考古是他填报历史志愿而不得，退而求其次的专业，以致于“大学四年，全是胡闹”。工作以后，考古是一门辛苦的职业，“农村物质条件不及城市，不免风吹日晒，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，有时确实是辛苦的”。

发掘雷峰塔地宫时，万众瞩目，冷门的考古一下子变成了显学。一觉醒来，报纸电视全是发掘地宫的消息。“我给母亲打了电话，说，孩子从事着一项有意义的工作，至少在今天是这样的”（《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》）。

曾有段时光，他被虚无感与焦虑所笼罩，抱怨重复性劳动无意义，抱怨人生无意义。迷茫之际，考古成了浇个人块垒的酒杯，“人类以最大的激情从事各种劳动，只为换取内心的充实，以抵抗宿命的悲哀。做点事情，有个念想，找个寄托，椅子坟如此，考古工作亦如此”（《龟山》）。

而真正能与虚无抗衡的，还是读书与写作。尤其后者，是将人与记忆、生命同构的过程。郑嘉励很喜欢廊桥研究者刘妍的一段话：“那些没有完成的故事，是内化于自身的生命碎片，还没有把故事讲完之前，我是残缺的。写完它，灵魂才能完整起来。是的，这一生都在做自己的拼图游戏。”

于是，他每完成一篇杂文，拼图就多一块。灵魂虽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，但可以确信的是，他会在“寻找自我”的道路上继续追寻，至死方休。

我很少将郑嘉励视作纯粹的考古学家，更多将他当成一个作家。《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所呈现的，不光是一个考古学家的成长史，更是一个作家从青涩走向成熟，从书本走向生活的成长史。



《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  
郑嘉励 著  
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